

# 經典 · 翻譯 · 辯讀

——第七屆“神學與人文學”  
暑期國際研討班會議綜述

Translating Classics and Scriptural Reasoning:  
Review of the 7<sup>th</sup>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高志强

GAO, Zhiqiang

作者簡介

高志强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GAO Zhiqi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dr\_gao@163.com

投稿日期 Submitted Date: Aug. 30. 2011

接受刊登日期 Accepted Date: Oct. 30. 2011

**Abstract:** The Seven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 Humanities was held in Beijing from August 3 – 7 2011. This Summer Institute was co-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The theme of the 7th Summer Institute was “Translating Classics and Scriptural Reasoning”. Nine distinguished scholars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lavic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Zurich,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he Taiwan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 Taiwa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n Australia attended the Summer Institute and gave lectures to young Chinese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as well as students from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out forty young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30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China submitted paper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ummer Institute. This paper is a summary of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y the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ries to present the main themes,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ummer Institute.

**Keywords:**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translating Classics; Scriptural Reasoning; summary

2011年8月3日至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和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協辦的第七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國際研討班在北京舉行。來自海內外的11位著名學者和來自全國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40餘位青年學者與會，圍繞着“經典翻譯與經文辯讀”這一主題進行了專題研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耿幼壯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討班，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應邀致辭，並就會議主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此次共有9位學者作了大會主題發言，他們分別是：斯洛伐克科學院高利克（Marián Gálik）教授、瑞士蘇黎世大學韋寧（Ralph Weber）高級講師、牛津大學/東京大學恰德（Robert Chard）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劉小楓教授、“台灣大學”林鴻信教授、“台灣中原大學”曾慶豹教授、美國貝勒大學丹尼爾·威廉姆斯（Daniel Williams）教授、澳大利亞紐斯卡爾大學羅蘭·玻爾（Roland Böer）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與會的大部分青年學者也提交了自己的研究論文，並參加了分組討論。

本次研討班的9位主題發言人來自不同的機構，發言內容也涉及到不同的領域。概括而言，9位學者的發言主要涉及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中國經典與經文辯讀，《聖經》翻譯與文化互動，中西經典與近現代思潮。與會青年學者亦在分組討論中宣讀了自己的論文，並就上述問題予以了熱烈的回應。

## 一、中國經典與經文辯讀

“經文辯讀”（Scriptural Reasoning）本是同屬亞伯拉罕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文獻研讀和思想對話。學者在其中發現：神聖的顯現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聲音也不會融為任

何一種獨白。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慧林教授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經典英譯本匯釋匯校”課題的主持人，近年來與西方學界展開合作，力圖使“經文辯讀”突破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獻的原有局限，借助傳教士所譯介的中國經典以及大量注疏，使之真正成為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的比較研究。在本次國際研討班上，楊慧林教授作的《理雅各與中國經典的翻譯》的講演延續、深化了這一研究思路。他認為對不同宗教傳統的經文進行“辯讀”，顯然包含着深刻的自我反省，而不同傳統在其中的相互理解、乃至由此重構的自我理解，對於當今世界可能尤為重要。但“向所有人以及所有的文化、宗教……和生活領域敞開”的“經文辯讀”是否能夠突破亞伯拉罕傳統，從而實現中西之間的“經文辯讀”呢？楊慧林教授相信傳教士，特別是理雅各翻譯的中國古代經典為中西之間的“經文辯讀”提供了豐富的資源<sup>①</sup>。

身為漢學家/傳教士的理雅各雖然希望借助中國的材料解釋中國的經典，并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踐行了這一理念，但在他的翻譯和理解活動中，其基督教背景還是清晰可辨的。楊慧林教授從理雅各對《論語》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翻譯闡明了理氏翻譯的側重點是使孔子的教導與耶穌基督的聖訓相互呼應；而他對《道德經》的翻譯則構成了《聖經》與中國經典之間的“辯讀”，期間不時顯露出的基督教“前理解”及其與老子思想的潛在關聯，的確體現了中西文化相互詮釋的可能。

理雅各基於自己的理解背景為譯文所作的大量注釋，不僅為中西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寶貴資料和直接綫索，也使我們得以窺見西方人究竟如何面對中國的思想和文化。楊慧林教授認為“如果我們能借助這些被普遍接受的譯本去回應某些人對中國的誤解或

<sup>①</sup> 理雅各的翻譯活動幾乎覆蓋了所有重要的中國古代經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選集》和《離騷》等。他“是把所有儒學經典翻譯成非亞裔語言的第一個非亞裔人”。（張西平、費樂仁語）

者‘妖魔化’，顯然也更具說服力。”

隨着世界對中國的更多關注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內在要求，近年出現了中國古代經典外譯的新一輪熱潮，楊慧林教授認為“重譯中國古代經典的前提，似應是認真整理已有的歷代譯本，特別是那些研究性譯本的相關注疏。由此才能直接切入西方學術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形成真正的思想對話”。就此而言，理雅各對中國經典的翻譯和注讀無疑都是絕佳的案例。這些中西“經文”之間的互譯、互釋、互訓的實踐可能會達成一種“非中心”（decentred）或“解中心”（de-centered）的“真正的思想”，而這正是包含在“傾聽”和“回應”的對話關係中的“經文辯讀”的根本命題。

瑞士蘇黎世大學政治學高級講師韋寧“追隨楊慧林教授的研究方向”，但將重點放在儒家學說上，考察其是否可以成爲一個研究“經文辯讀”的好案例。他將“經文辯讀”區分爲三個不同的層次，其中第三個層次的目標是發掘亞伯拉罕傳統之外的價值，韋寧認為“這比僅僅逆轉迄今爲止尚無效果的學院派的信仰間對話的影響更爲深遠”……在此意義上，“經文辯讀被認爲具有巨大的價值，甚至是對全人類命運來說至關重要的價值，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神學詞匯發出了最強音”。

韋寧博士通過考察英語“scripture”的演變，認爲在世界範圍內……存在着類似……聖經之經文功能的文本，在“某些語境”中，scripture 可以適用於儒家的“經”；而在考察漢語“經”的發展過程後，他認爲中文的“經”字實際上在正典化的過程中……確認了一個不同的權威……使它最終成典；“與正典相關的權威性可能會形成一個 scripture 與‘經’的共同基礎”。韋寧用一種邏輯學的方式表述了他對這兩個詞語關係的看法，即“所有的 scripture 都是經，而並不是所有的經都能成爲 scripture”。由此對參與“經文辯讀”的儒家學說來說，“經”應該在一個相對狹義的、接近“經典”意義的基礎上理解和運用，同時還須是確然具有宗教特點的儒家典籍。韋寧的結論是“儒家學說需要首先進行重新包裝才能參與到‘經文

辯讀’中來……作為宗教的儒家學說本身可能會因此而超越‘經文辯讀’的語境而得到更多的認識”，但絕不應該成為任何形式的“亞伯拉罕式儒學”。

來自台灣大學的林鴻信教授從一個更具體的角度為中西“經文辯讀”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林鴻信教授認為基督教信仰主張天與地同為被造，天地相連為最高理想，“天”一方面代表了上帝，一方面從感官所見之天轉成上帝國真理的義理之天。天雖然高不可攀，却有對人開放的可能，強調的是天對地以及居住地之人的開放性，呈現出一種人世的人文精神。而中國傳統的“天”有“自然天”、“義理天”與“神性天”之分，其涵義從宗教、政治而逐漸轉向道德的強調，這成為中國哲學的特質。相比較基督教強調“天對人的開放”，儒學比較強調“人對天的開放性”，林教授認為這樣一種由人而天又由天而人，且由天而人又由人而天的回環可成為儒學與基督教進行經文辯讀的思考方式之參考。

牛津大學/東京大學的羅伯特·恰德通過研究理雅各對“禮”的理解和西方學界近期一些對“禮”的研究，認為西方知識界對於“禮”的理解，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西方知識結構的制約或影響，這既可能造成曲解，也可能帶來新的視角與啟迪，從而豐富和深化對“禮”的研究。

山東大學威海分校中文系的管恩森通過追溯中西“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從理論層面闡釋了中西之間“經文辯讀”對於當下人文學科的跨文化對話所具有的重要理論啟發與實踐價值。中國人民大學趙偉、高志強則通過對理雅各翻譯的《道德經》和《論語》的分析，從不同角度闡明了中西之間“經文辯讀”的可能。北京華文學院的成盈秋以“將”的翻譯及其語法化為例，從共時變異與歷史發展兩個角度，試圖探求翻譯經典著作中語法化等級較複雜的高頻詞的合理途徑。

## 二、《聖經》翻譯與文化互動

《聖經》作為西方世界的基本“經典”，在傳統意義的“經文辯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近代以來，《聖經》的中譯與中國經典的西傳過程可以說是緊緊交織在一起的，這些翻譯活動對於不同傳統之間的相互理解、乃至由此重構的自我理解，都具有普遍的借鑒價值。

美國貝勒大學宗教系的丹尼爾·威廉姆斯教授在此次研討班上作了《猶太教和基督教對希臘智性文化的修復》的報告，重點討論了古代希臘文化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複雜關係。在講座中，威廉姆斯教授論述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臘化和希臘——羅馬世界的基督教化。他認為在古代，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詮釋者將古代猶太教、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的視野融合起來，表達了共同的形而上學和道德理念。最為突出的就是教育（*paideia*<sup>①</sup>）的形成和對美德（*virtue*）的追求。

來自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的曾慶豹教授從“解釋主權之爭”的角度，重新闡發了基督教遭遇中國古代經典，在中國進行傳播時所引發的“譯名之爭”。他在《明末天主教的譯名之爭與經文辯讀》的報告中談到“禮儀之爭”是一個與“本地化”糾纏在一起的問題，對外來宗教來說，一旦援用了在地化的資源，其“正當性”就永遠成了話題。“‘禮儀’不過是一個表現系統，其真正涉及的……仍然是‘天主’或‘上帝’（即 *Deus*）代表的意義……（經過翻譯）產生了怎樣的關係變化和沖突”。曾慶豹教授“將禮儀之爭的問題鎖定在‘譯名之爭’的核心問題上……涉及的正是‘翻譯’的政治神學問題：究竟誰擁有‘翻譯（主）權’”。因此“譯名之爭”所涉及的經

---

① *Paideia* 幾乎完全等同於我們今天所講的文化理想，在這個意義上，*Paideia* 可以定義為希臘教育的理想和目的，是為教育過程的終極目的所提供的優雅、美德、高貴和巧妙的混合物。（陳恆語）

文辯讀問題，就是如何對待經典以及對它的解釋問題。

曾慶豹教授講到明末儒者王啓元對天主教掀起的“譯名之爭”極爲重視，他意識到天主教的“經文辯讀”會造成“斥小中國之儒宗，混淆上帝之名號”，因此要“尊上帝以辨天主”，并提出以“儒教的三位一體”（上帝、孔子、皇帝）對抗天主教學說。曾慶豹教授認爲王啓元的“譯名之爭”已非天主教教派內部之爭，而是“跨文化/文本/宗教”的政治神學之爭。耶穌會士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引經據典，想通過經文辯讀確立六經的上帝與天即意指最高主宰，天主即上帝，“特異以名也”。曾慶豹教授認爲當“利瑪竇決定以‘上帝’來翻譯 Deus 時，其實是表達了以‘我們的概念’來‘解釋原作’的想法，這樣‘解釋原作’就更多的成爲一種發明而不是一種發現”。

鐘鳴旦曾指出“譯名之爭”的詮釋學問題，即在於究竟如何看待“原典（原儒）與注疏（後儒）之間的關係。耶穌會士龍華民在《論中國宗教的若干問題》中表示當以“上帝”來翻譯至高神時，對中國的注疏者是有利的，這意味着對於“上帝”的種種解釋，將影響或滲透入對天主教至高神的解釋。曾慶豹教授認爲以往“學界對於‘譯名之爭’的討論，大都夸大了龍華民與利瑪竇之間的對立，……龍華民之所以成了眾矢之的，當然與萊布尼茨反駁龍華民的效應有絕對的關係，……多數論者……支持萊布尼茨并同情利瑪竇且靠向中國，……政治神學的意味極爲鮮明，……而這正是‘譯名之爭’的‘經文辯讀’的真正問題所在。”

在《聖經·舊約》諸部分中，《雅歌》也許是在中國閱讀和翻譯最多的。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部教授高利克在《聖經中文翻譯（1919 - 2004）中的書拉密形象》的報告中，比較了《官話和合本》（1919），《歌中之歌》（陳夢家，1932），《新舊約聖經》（呂振中，1970），《聖經》（思高版，1968，1992），《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現代）和《新譯和合聖經》（新譯，2004）這六個版本的《雅歌》中唯一有名有姓的女性形象——“書拉密”在不同中文譯本中的差異。



高利克教授發現《和合本》與《新譯本》的譯文是極為相似的，大體上只是格式的變化，而陳夢家的翻譯更加文學化，最富有詩意。總的來說，這三個版本的“譯文都具有簡潔的特點，與原始文本非常接近”。不過，天主教思高版聖經“突出忠實性和易懂性”，該版本“追溯原始文本”並採用“簡潔優美的國語進行翻譯”。而《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遵循奈達的“動態(功能)對等”原則，強調“信息在譯入語使用者中的可交流與可理解性”，將舊約與新約譯為當代中國讀者可以理解的經文，最具有當代特點。《現代中文和合本》雖然在序言部分批評了《官話和合本》，但高利克教授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看到它還是基本遵循了經典的《官話和合本》。

通過翔實的文本分析，高利克教授認為，由於經典《聖經》譯文的新版單卷本在中國銷售影響較廣，具有更高的利潤，所以出版商熱衷於不斷推出新譯本，“被認為是上帝之言的《聖經》已然成為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的一部分”。

此外，一些與會的青年學者也在各自的研究中注意到了異質文化間有關宗教翻譯的問題。中央民族大學文傳學院的宋旭紅從文化互釋的角度闡述了利瑪竇與中國信徒之間關於譯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對對方的誤讀和對自己文化的調適為基礎的，而該政策的最終成與敗則提示異質文化間的對話與交融必須在一定限度內進行方能有效。河南大學聖經文學研究所的王鵬分析了李提摩太受其傳教士身份的限定，在翻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佛經時有出明顯的基督教化傾向，表現出有意、無意的文化誤讀。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的何廣順在中文語境下重釋了《約伯記》，認為其偉大智慧就在於它始終探討着這樣一個永恆的主題：有限的人如何在現實性的遭遇中走向無限者和絕對者，如何從世俗走向神聖，如何從人間走向上帝。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張靖從“古老的智慧”入手，對聖經《箴言》中的“外女”(foreign woman 或 strange woman)形象進行了新的詮釋。

### 三、中西經典與近現代思潮

經典之價值，不但在於其典範性和權威性，更在於其歷久彌新、生生不已的意義和智慧。中西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不斷注目於經典，返回到經典，從中汲取不竭的思想資源。

現代新儒家“開宗大師”熊十力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際（1949至1951年），先後刊印了5篇文獻：《十力語要初續》、《韓非子評論》、《摧惑顯宗記》、《與友人論張江陵》和《論六經》，這些文獻皆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五卷。一般而言，熊十力被認為是一位闡揚體用不二、明心見性的典型的哲人。但在此次國際研討班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劉小楓教授在《熊十力如何讀六經》的講座中，帶領與會青年學者細讀了熊十力先生的《與友人論六經》，提出“深究唯識、弘闡《大易》《春秋》微言的十力儒學，絕非空玩心性之學，而是有着深切的政治關懷——十力先生不僅是形而上學大家，也是政治思想大家”的觀點。

劉小楓教授認為《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比其它各卷更為全面、集中地反映了十力的思想”，其中《論六經》一文是“十力對自己一生志向和思想的概括性自我闡述，……同時也是一次政治行動，……為我們把握十力先生的立志以及一生中諸多‘直湊單微’的授學講記和語錄提供了綱要，……以‘論六經’為題，為何和如何為學就具體化為為何及如何閱讀我國古傳經典。”

熊十力所處的時代正逢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的偉大變革時機，他“感世變益劇，哀思人類”從而走上形而上學之路，試圖以自己的學述力挽“耽空溺寂之頽流”。劉小楓教授認為正是經過形而上學的“一歸於己之所實參冥會”，熊十力才得以從一位普通革命者脫胎為偉大的革命家：從拿槍的革命人成為思想的革命家。熊十力認為如果共和革命“黨人”沒有在“身上下作功夫”，革命最終難以成功，即便奪取政權，也缺乏建立新制度的精神根底。共和革

命需要形而上學的或心學的支撐。

劉小楓教授通過研讀《論六經》得出“爲了共和革命而問學，是熊十力在二十世紀而中國世變的歷史境遇中所獲得的獨特際遇”的結論，而正是這一點決定了熊十力如何做學問：服膺心學，唾棄考據之學——因爲考據無益於當下的共和革命，從而化育“中國固有文化”，憑靠心性形而上學成爲“治天下的聖王”。

把“列寧”和“基督教福音書”放在一起，對一個平素對宗教、基督教神學和聖經關注甚少的人來說是一個奇怪的組合。但來自澳大利亞紐斯卡爾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的羅蘭·玻爾教授通過詳細分析列寧運用的一個很重要的有關組織的比喻，即《馬太福音》第13章中有關“雜草”(tares)的比喻。他發現福音書的確在《怎麼辦？》(1902)甚至列寧的所有著作中都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此次《和列寧一起翻譯福音書》的講座中，玻爾教授發現列寧在《怎麼辦？》中多次引用“雜草”這個比喻來“重新思考共產黨(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結構，特別在需要分辨力、有活力的公開討論及辯證地看待非法與合法組織關係等方面”。不僅如此，列寧還在著作中援引了《聖經》中其他與農業有關的那些“強調種子、生長及收割的比喻”，並“創造了大量自己的比喻”。玻爾教授認爲列寧對聖經文本的征用和改編使得他“看起來像一位有創意和新意的釋經者(或翻譯者)”，這爲聖經詮釋提供了新的視角。

據玻爾教授分析，列寧對《馬太福音》第13章中比喻解釋的末日啓示語調並不感興趣，除了一個關鍵的說法“好種是天國之子，雜草是惡者之子”。列寧對福音書中“小麥”和“雜草”的比喻進行了創造性地運用，他將“小麥當成自己人，自己戰鬥中的盟友，而雜草則被認爲是自己的對手”。列寧所關心的“不是聖經注釋的細節，也不企圖去確定聖經比喻游移變化且最終無法追索的原初意義或意圖”，他感興趣的是“直接運用”，玻爾教授將此稱之爲“列寧的布道關懷”，即列寧使用聖經的比喻所針對的是“當下所關注的問題”，“解釋的任務是要展示文本如何能針對我們所關注的問

題。”由此，在列寧解釋比喻的背景中，合法與非法政治活動的關係成爲關鍵問題：在列寧看來，堅持社會主義運動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非法與合法組織形式的合并的革命者，也即圍繞在《火星報》周圍的人“都是小麥”；而“雜草”——在《怎麼辦？》中——則是那些堅持只要合法組織的人，即祖巴托夫的工聯、經濟派和有着自己報紙的敵對組織。

在《聖經》中，《馬太福音》第 13 章這個比喻其含義并無確定答案，列寧挪用了這個比喻的背景，使得聖經比喻與他所處的環境相關起來。玻爾教授講到“雜草比喻的重要性在於表達了列寧在《怎麼辦？》中論述的一個關鍵因素”，“他在後來的著作中不斷摘引《怎麼辦？》……來表述自己的核心觀點。”對於列寧爲甚麼要用比喻，特別是那些明顯與農業有關的比喻，玻爾教授認爲列寧“一直對與農耕有關的事情感興趣”，尤其關注“參與了這場革命的千百萬農民”：因爲廣大農民群眾是革命的主力軍，而且他們的世界觀是通過聖經來構建的；因此《聖經》中有關農業的比喻最能直接打動農民，這是其他任何故事都無法相比的。

列寧雖然堅持與“雜草”戰鬥，但他并不是一位宗派主義者，力圖摧毀所有不同政見者。列寧主張“政党内斗争能够增加一个政党的力量和活力”，因此在其作品與政治實踐中“一直有一種宗派主義和普世主義關懷之間的張力，渴望與對手劃清界限與希望建立聯合戰綫之間的張力”。“組織”是《怎麼辦？》中的中心問題，伴隨着列寧大量引用《聖經》的比喻，福音書在這里變成了革命組織的資源，爲革命軍事活動的組織結構提供了絕好的模板。

玻爾教授最後總結道，列寧這些解釋和翻譯福音書的過程，使得這些故事和比喻本身變得更激進了，也使得聚集在福音書周圍的“信徒”（社會主義者）變得越來越激進了，這些都使福音書信息變成了變革的革命信息，從而轉變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坐標。正是列寧的解釋揭示出了這些比喻內在的範疇。

近 20 年來，西方學界對保羅的研究構成了一場保羅復興運

動，寧波大學中文系的葛體標認為阿甘本的《剩餘時間：〈羅馬書〉評論》與齊澤克、巴丟等人不同，他延續了本雅明、陶伯斯的思路，提出了剩餘時間的主旨，是一種對《羅馬書》的彌賽亞主義的讀法。湖南女子學院外語系的羅艷通過分析蘭斯頓·休斯的短篇小說《讓我奏響布魯斯》，闡釋了休斯文學創作的一個意圖：以黑人的生存困惑提出“上帝在哪裡”的詰問，從而質疑美國主流社會中宗教信仰的合理性。格拉斯哥大學批評研究學院的汪海認為不斷生成的“他者”的“翻譯”正是解放經典和經典解放“我們”的途徑。

#### 四、研討的其他問題

本次國際研討班共收到與會青年學者的學術論文 41 篇，除以上三個方面的論題外，這些論文還涉及明清傳教士研究（賈蕾、孫彩霞、黃薔等），神學研究（張華、鄭鈺、李安、南宮梅芳、芮欣、殷振文等），詩學與藝術研究（羅如春、趙山奎、楊道聖、蕭湛、陳霞、江玉嬌、任裕海等），文學與基督教關係研究（陳瑞紅、李志雄、陳秋紅、張欣、劉麗霞、郭曉霞、劉燕、張艷萍、鄧國琴等）、明清儒學研究（陳叙）和古典詩詞英譯研究（鄭淑明）。在研討班上大家發言熱烈，互相辯論，磨礪了思想，交流了學術心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此次暑期國際研討班的成功舉辦行再次表明，當今世界的多元文化語境已經使得跨文化、跨宗教的對話不但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而探討中西經典在不同文化間的翻譯將會幫助我們找尋這種對話的原則和基礎，通過翻譯可以從一種異質視角觸動經典產生新的意義，這種意義又反過來啓發翻譯者反觀自身的文化經典。這種平等而有效的對話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他者”，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經典和傳統，從而破除單一主體，形成由多元的“他者”共同參與的、尋求智慧的活動。